

" MEITI YU WENYI " CONGSHU

“媒体与文艺”丛书

黄鸣奋 主编



王 烨 / 著

新文学与现代传媒

学林出版社

“媒体与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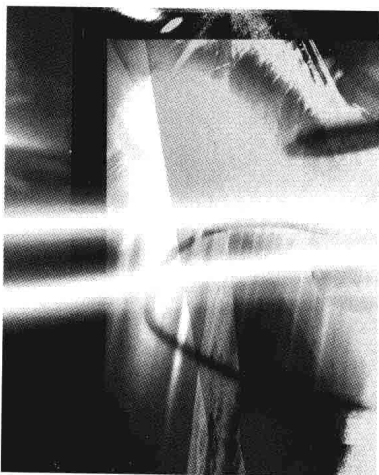
丛书

“MEITI YU WENYI”

CONGSHU

新文学与现代传媒

王 烨 /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与现代传媒/王烨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1

(媒体与文艺)

ISBN 978 - 7 - 80730 - 690 - 0

I. 新... II. 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
国—现代②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③传播媒
介—文化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K260.3
I209.6 G206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231 号

新文学与现代传媒



作 者——王 烨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89 × 1194 1/32

印 张——7.5

字 数——20 万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690 - 0/I · 121

定 价——1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19世纪以来,由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所推动,媒体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发展,迅速完成了由慢媒体向快媒体、由贫媒体向富媒体、由单媒体向多媒体等转变。相对于社会需要而言,媒体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不再匮乏,而且已经“溢出”。我们为各种各样的媒体所包围,无力消化它们所提供的海量信息。报纸越来越厚,广播电视频道越来越多,网页甚至增长到了天文数字。媒体不仅早就是产业,而且在并购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帝国”,在全球范围内营造着与之相适应的信息世界,左右着社会生活。

在媒体加速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文艺也经历了巨大变革。各种形式的“终结论”以前所未有的高分贝一再宣布文艺之死,但事实上文艺却以同样前所未有的高能量显示自己推陈出新的活力。文艺生产的效率越来越高,文艺发表的门槛越来越低,文艺门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艺流派的迭代越来越快,文艺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文艺受众的参与热情越来越看涨。文艺早已走出象牙之塔,融入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泛化”。

媒体发展与文艺变革之间,绝不只是简单的历史同步,而是充满了各种形式的互动。各种崭露头角的新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向文艺伸出橄榄枝,力求借助文艺的魅力为自己拓展空间;各种笋尖乍冒的新文艺也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媒体奏响欢迎曲,试图借



助媒体的影响为自己创造机遇。因媒体科技势力日强所引发的社会焦虑,在各种以警世为已任的文艺作品中得到生动而形象的表达;因文艺发展日益偏离传统轨道而引起的社会担忧,则在主流媒体中转化为提醒、告诫甚至严厉的批判。媒体与文艺共舞,不论谁是狼,也不论踏的是什么步点、有过多少碰撞,渐渐地都心灵相通、配合默契,旋成了一团光影、一束音流。在媒体溢出、文艺泛化的时代,是谁起舞仿佛已经无所谓,重要的是“共舞”本身。

这种共舞不仅是我们所目击的现状,而且有着可圈可点的历史。生活在媒体溢出时代的人们虽然并不需要再度从事“韦编三绝”之类的活动、追求“学富五车”的境界,也不需要重复抄写员艰巨的劳动、甘冒排字工铅中毒的风险,但历史回顾毕竟有助于我们明白精神生产和文艺活动如何受制于特定时代的媒体科技所提供的条件。在历史上,媒体变革不止一次推动了文艺形态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文艺依托媒体而传播,在媒体内容中占有重要地位。本丛书着重研究 19 世纪以来媒体与文艺的互动,所收入的著作大致分为四组:一是有关大众文化与艺术观念的历史审视,二是作为大众媒体的报刊在中国新文学兴起、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三是电视艺术在信息加工、传播观念、运营策略等方面的特点;四是在媒体网络化、数字化过程中诞生的新型艺术产业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探索增进对媒体与文艺之关系的认识。

从 19 世纪以来的两百年,在历史上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尽管如此,它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偌大的地球在心理空间中变得如此之小,以至于人们只好用“村”来形容它;信息水晶球在信息基础设施中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逃不过它的监督。媒体溢出的时代也是普适计算像自来水一样方便的时代,是商业炒作像火焰山一样炽热的时代,是不苟流俗像独木桥一样难行的时代,是精神生产像“巨无霸”一样“快餐”的时代,是文艺创作像奶油烤一样杂拌的时代。处在这样的时代,我们

仍希望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心态不随媒体溢出而溢出,能够清醒地和读者就丛书所涉及的各个议题进行对话,并在反思的过程中求得认识的深化。

本书的出版得到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基金的资助。学林出版社编辑曹坚平先生热心玉成此事。谨此致谢。

黄鸣奋
2007年8月

目 录

总序/黄鸣奋	1
第一章 新文学与现代杂志	1
第一节 《新青年》上海时期的生存策略与文化蕴涵	1
第二节 《新青年》与新文学发展潮流的疏离	12
第三节 《中国青年》的革命文学倡导	22
第四节 《评论之评论》的“革命的文学”讨论	29
第二章 现代文学副刊与初期革命文学运动	36
第一节 《文学旬刊》的革命文学“讨论”	36
第二节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与初期革命文学倡导	45
第三节 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的革命文学呼唤	57
第三章 鲁迅文集的出版与传播	73
第一节 《漫》的翻译对鲁迅的影响	73
第二节 《苦闷的象征》对钱杏邨文学批评的影响	82
第三节 《两地书》的出版及接受	94
第四节 革命文学论争与鲁迅左翼身份的建构	103
第四章 新文学作家与现代传媒	113
第一节 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后的文学翻译	113
第二节 闻一多早期诗歌评论的“影响焦虑”	120
第三节 20 年代文化语境对革命诗歌的影响	127
第四节 莎菲作为“Modern Girl”形象的特征与意义	135



第五节 创造社转向期间的革命文学创作·····	146
第五章 新文学的社会传播·····	169
第一节 春柳派与近代上海的脆弱情缘·····	169
第二节 初期革命文学萌生时期的历史遭遇·····	176
第三节 20 年代末革命文学思潮中的“戏仿”现象 ·····	188
第四节 丁玲早期小说的悲剧意识及误读·····	197
附录:初期革命文学资料编目(1921—1927) ·····	209

第一章

新文学与 现代杂志

第一节 《新青年》上海时期的生存策略与文化蕴涵

1917年2月,陈独秀携带创办不到两年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开始了《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的结合,开创了中国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于北京时期《新青年》,胡适曾经有过感言,他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再一个就是《新青年》。^①现在,研究者多探讨《新青年》北京时期留给今天的仍然充满活力的话题,但对这阶段的专注或偏执是否会遮掩它在上海时期那段并不辉煌的历史,是否会带来对《新青年》整体认识的模糊或偏差呢?毕竟,《新青年》的整体历史呈现出更为宽阔的社会与文化现象。

上海时期的《新青年》,主要指1915年9月创刊到1917年2月陈独秀出任北大文学长前编撰的两卷杂志。选择这段时期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这份杂志命名带来的困惑,一份掀起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青年文化”的杂志,它最初命名的历史机缘和背后的思

^① 胡适《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1923年75期。



想资源是什么？刊物原初的性质或宗旨是什么？最后，相对于北京时期“一校一刊”模式，上海时期《新青年》杂志的生存特征又是什么？这些研究可使《新青年》上海时期的历史面貌真切地“浮出地表”。

探讨《新青年》“命名”的研究很少，少数的研究多关注《青年杂志》到《新青年》的更名过程及带来的“新”性质。那么，《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初，陈独秀为何选择“青年”作为刊物的名称？或者说，命名的历史机缘与思想资源是什么？

我们知道，陈独秀创办这份杂志比较仓促。1914年7月，他参与安徽“二次革命”失败后，为了避祸与生计问题，去日本投靠《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在日本期间，他努力写文章并帮助编辑《甲寅》，并没有创办杂志的设想。1915年初夏，他接到好友汪孟邹的信，知悉妻子病重及家计难以为继，便匆忙赶回上海。就在这次返回上海的海船上，“他酝酿自己创办一份杂志，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①回到家中隔日，他便和汪孟邹商谈创办杂志的事情，最后由上海群益书社出资出版，1915年9月15日问世，定名为《青年杂志》。

“青年”一词在中国之前的杂志中很难寻找到，它们使用更多的是用少年、童子、学生等来命名杂志。^②那么，陈独秀为何选择这个陌生的新词命名自己的杂志呢？或者说，陈独秀与它究竟有何历史的因缘呢？我们知道，陈独秀早在1902年春参加了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1902年回国后在安庆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不久，他又与张继、冯自由、苏曼殊等人组织“中国青年会”。时隔十几年后，陈独秀是否记起自己往昔的革命激情，选取了“青年”作为自己杂志的名称，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更为重要的历史启示

① 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50页。

② 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少年杂志》、《儿童世界》，中华书局《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等。

来自杂志创办的第二年,上海青年会指责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面对对方的要求,群益书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自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回顾近代新闻出版史可知,上海 1903 年创刊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读者的杂志取名《童子世界》,商务印书馆 1911 年发行的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取名为《少年杂志》,而在 20 世纪初,凡是以“青年”命名的杂志,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刊物,《上海青年》及《女青年报》等就由该会所办。

陈独秀以“青年”为自己刊物的名称,如果不是缘于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就很可能是对基督教教会刊物的附会,而这种“冒牌”可能是迫于当时政治的压力。那时,袁世凯迫害革命党人,北洋政府颁布的“报律”挤压着进步报刊的生存空间。据称,“1911 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的新闻事业一度迅速发展,新创办的报纸达 500 种左右,其中北京 50 种,上海 15 种,汉口 6 种;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期间,北京的报纸减少到 20 种左右,上海减少到 5 种,汉口减少到 2 种。1913 年后的两年,全国报纸的发行量也从 4200 万份减少到 3900 万份。”^①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报界有人主张报纸挂上“洋旗”,有人主张把报纸迁到租界,以便利用外国租界势力保护报刊生存,这已成为出版业、新闻界的普遍意识与行为。作为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为避免政府报律的滋扰与迫害,利用西方宗教色彩的名称伪装自己的杂志,这可能是《青年杂志》如此命名的生存策略。这种考古性质的历史探询似乎抹杀了《新青年》杂志的“激进”性质,但却让我们发现并看到了《新青年》为应付生存的“社会”情景,为生存而必须选择的诸多“变通”方式。

不仅如此,《青年杂志》的生存策略背后可能还蕴涵着文化关系,象征着现代知识分子与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关联。《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就指出“本志之作,欲盖与青年诸君商榷所以修身

① 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 年,第 60 页。



立国之道。”^①同时，他对时局、对国民性、对传统文化也产生深刻怀疑：“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②他由此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③陈独秀的这种认识当时相当普遍。李大钊认为：“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④胡适后来也回忆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的基础。”^⑤可见，当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处于大崩溃时代，即使是保皇党派也提议将孔教列为国教，以便“欲救人心，美风俗”。^⑥陈独秀虽反对立儒教为国教的主张，选择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作为拯救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但他与基督教的文化关系却是人所共知的，而这常被人们忽视。

在五四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与基督教的文化关系最为密切。从1915年至1924年的10年间，他发表一系列评论基督教的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因主张输入基督教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关注。陈独秀在1915年为《绛纱记》作序时，把基督教与佛教进行比较，认为基督教优于佛教，他说：“耶教不否定现世界，且主张神爱人类，人类亦应相爱以称神意。审此耶氏之解释死与爱二问题，视佛说为妥帖而易施矣。”他1916年比较基督教与儒教时，认为前

① 《社告》，《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②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卷6号。

③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1卷6号。

④ 《李大钊文集》（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⑤ 《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188页。

⑥ 《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846、733页。

者比后者有价值,“又若基督教尊奉一神,宗教意识之明瞭,信徒制行之清洁,往往远胜于推崇孔教之士大夫。”^①他1917年再次将基督教与孔教对比,说:“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会之量,视孔教为也。事实如此,望迂儒勿惊疑吾言。”^②1919年,他谈到朝鲜独立运动时,对基督徒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这回朝鲜参加独立运动的人,以学生和基督教徒最多。因此我们更感觉教育普及的必要,我们从此不敢轻视基督教。”^③1920年,他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说:“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说耶稣的伟大体现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它们成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当然,陈独秀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也有“非宗教”的言论。他在《孔教问题》中说:“愚之非孔,非以其为宗教也。若论及宗教,愚一切皆非之,绝非为扬他教而抑孔子也。”他的《偶像破坏论》又说:“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華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与破坏。”陈独秀对自己似乎矛盾的观点有过解释。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撰写了《基督教与基督教会》,说“我始终总觉得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当分别观察”。他把基督教一分为二成“教义”与“教会”,对两者的态度各有不同。总之,陈独秀选择“青年”命名杂志,以“伦理的觉悟”为办刊的目的,基督教对他的文化影响绝对不容忽视。

①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1916年2卷3号。

② 陈独秀《答刘竞夫》,《新青年》1917年3卷3号。

③ 《陈独秀著作选》(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基督教青年会^①当时在中国影响很大。到1922年,全国青年会、市会有40处,会员达53800人,校会200处,会员24100人,其活动得到北京政府的承认。基督教青年会十分注重德育作用,以人格救国相标榜,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进入20世纪后,它在中国的活动更加本土化,集中关注中国社会的问题,如青年教育、社会平等、改善劳工待遇、女子解放等等问题。1915年后,担任该会总干事的余日章经常说,“中国今日之需要,并不在于海陆军,也不在于兴办实业,而在于人民的道德,故道德是‘需要之需要’”,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则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谈”^②。有意味的是,基督教青年会这些言行,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思想具有一致性。而作为正在面向现代思想文化的陈独秀,他的“最后觉悟之觉悟”的思想方式与社会呐喊,跟基督教青年会的文化影响应有较密切的关系。

无论是《青年杂志》的生存策略,还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影响,它们在《新青年》上海时期的生存中都显得非常隐蔽。换句话说,陈独秀没有把杂志办成基督教青年会色彩的刊物,相反,他通过“伦理革命”展现的是自己的“政治”情怀,是现代“人权”观念的文化启蒙。

众所周知,陈独秀更改《青年杂志》名称时,没有放弃“青年”一词,只添加一“新”字。许多研究者指出,《新青年》上海时期定

① 基督教青年会19世纪40年代诞生于英国,中国第一个青年会组织是1885年在福州英华书院成立的“学生青年会”。1897年1月3日至4日,青年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学塾青年会。1912年,青年会在上海建立总部,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1923年,青年会在上海设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

② 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13页。

位模糊,没能超越当时刊物的思想藩篱,更没有显示出“中国文艺复兴者”的清楚面目;而人们对于《新青年》“新”的认识,又多从进化论或新思潮角度进行阐释。这些也许只是一种“误读”方式,我们知道,严复译作《天演论》的出版与许多新思潮的引进在晚清时期已开始,到陈独秀 1916 年 9 月更名《青年杂志》的时候,它们似乎已失去“新”的性质,作为招徕读者的杂志名称似乎失去意义与价值。那么,陈独秀使用“新”究竟所指为何呢?

1915 年之前的陈独秀,最耀眼的身份是“革命党”,他从“民前”的反清活动到“民后”的“护国运动”,目的始终是希望实现“共和制”国家的梦想。但是,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日益腐败,社会显示出堕落、残破、野蛮的景象,而此时,康有为执着于立宪梦想,孙中山热衷于民族革命。陈独秀创办杂志呼唤“伦理革命”,并非要传播基督福音,而是念念不忘创建共和制国家,正如胡适所言,他“要在非政治的基础上建设政治”。这是陈独秀不同于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的地方,他的关注点始终是政治,伦理的觉悟或新思潮的引进只是他实现心曲的途径。陈独秀把《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脱离革命党气质,但是,他将“新”添加在“青年”前面,或许表明他此时已拥有了“新”的思想成分。

阅读陈独秀的“新青年说”,我们就会联想起梁启超的“新民说”。梁启超“新民说”问世后,中国知识分子多把“民”理解为民族精神的整体表达,“即社会进步和幸福的关键在于一种系统地表述的精神的生命力和活力,这种精神通过共同的民族心理而表达出来”。^①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挫折带来一种幻灭情绪,革命知识分子严厉批评民国道德腐败时,也转向了对民族文化的质疑,对国民性和民族心理的批评愈来愈多。面对这种状况,梁启超提出家族主义的拯救方法,以便“促进集体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②。

①②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03-404 页。



革命派则集中在《甲寅》杂志周围,这是一个“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的政治性质刊物,围绕“民族国家”而宣传一种思想,即“从族群的社会的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现实,他们相信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根本就是——一个整体利益的问题,而整体目标的解决也就是个人的现实要求的达成”^①。总之,“国家主义”当时成为时代潮流,无论保守派还是改良派、革命派都强调“爱国”意识,并将整体利益视为个人必须效忠的对象。这种强调个人效忠“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特征。

陈独秀却开始质疑这种国家主义思想。他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而“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认为“爱国”必须以“自觉”为前提,而不是盲目或愚昧地爱国。他说:“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吴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陈独秀高举个人权利与思想自觉,与盛行一时的国家主义形成对抗,引起读者纷纷抗议,以致章士钊特意写了《国家与我》替陈辩护,说陈并非“侈言国不足爱之理”,而是“惟吾民于此诚当自觉”。

陈独秀在日本协助编辑《甲寅》的时候,就萌生了推崇“人权”的新思想,与革命派知识分子产生分歧,显示出一种“特立”的精神意识与文化态度。针对章士钊的政治觉悟,他提出伦理的觉悟;针对章士钊的国家主义,他转向个人主义。这些预示着思想界将发生重大历史转变。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明确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强调科学和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②人们多把科学、民主看成《新青年》揭橥的两面现代旗帜,然而,通观上海

① 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4期。

②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时期的《新青年》，陈独秀标举的“人权”并不同于后来的“民主”，它更多有个人本位主义色彩。所以，个人主义不仅成为陈独秀“伦理的觉悟”的思想核心，成为贯穿上海时期《新青年》杂志的宗旨，而且也该成为《新青年》所以为“新”的意义所指。

陈独秀“人权”强调的是人的自主权，就是个人的解放与自由。他这样定义人权：“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成人以往，自非努力，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①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个人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民主政治的现代建构，而旨在摧毁旧的政治思想文化枷锁，以谋求个人及社会的解放，“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②。从这个方面审视上海时期的《新青年》，就不难理解它关注的范围如此之广，妇女解放、青年修养、体育问题、孔教问题以及文学问题等等，都成为陈独秀“伦理的觉悟”所要讨论的。

现在的问题是，与北京时期“一校一刊”相对应，上海时期《新青年》依托的社会力量是什么？它的社会生存策略是否遮蔽刊物宗旨、影响宗旨的“不清楚”？陈平原考察《新青年》时指出：“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③这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了思路。

《新青年》诞生于上海，上海是它的诞生之地，也是它的养育之母，上海的社会文化状况深深烙印在它身上。1915年前后，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不仅拥有全国重要的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1卷4号。

②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③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3页、52-53页。